

十月十五日

蕭軍



1216/44

十月十五日

著 軍



20949243

十月十五日

萧 军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2插页 86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100

书号 10099·1665 定价 0.41 元

207/21

新版前记

萧 军

本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去参加了由煤炭工业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茶点会。会的目的是宣布他们奖励煤炭系统工作人员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性，不但在政治上给以支持，同时宣布了在经济上也给以支持，这是一个创举。希望他们在这开明的创举前提下，能够有更多的业余文艺工作者涌现出来，以丰富我国的文艺界。

我本人由于在题材上曾经写过关于煤炭生产的小说，所以也承蒙邀请参加了——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荣幸！

在这《十月十五日》集子中，所收的《四条腿的人》就是我以采煤工作者为题材的第一篇小说。那个采煤工在德国帝国主义者经营的煤矿上被轧断了双脚，锯掉了，给了他很少的钱，逐出矿外，从此就“爬”着、乞讨着生活在这人间……。

这篇小说是我在一九三六年秋和一位朋友路经山东博山，到那时由日本帝国主义者经营的煤矿上去参观以后，所留下的印象和事实而写下的。

第二篇以煤矿生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是一九五二年写成的。由于我在书中描写了官僚主义——由于它造成了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这书那时虽然经过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勉强得以在一九五四年出版，而最终还是被出版界的官僚主义者们扼杀——“决不再版”了。

可喜的是在新中国的煤矿里，再也不会 有《四条腿的人》那种悲惨的遭遇，采煤工人成了国家、煤矿的主人。现在文艺出版界的官僚主义也有所克服，我的《五月的矿山》又得以再版了。

本集中其他几篇，我就不多罗嗦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于北京团结湖

前 记

—

昨夜读完了斯文赫定博士的一部《亚洲腹地旅行记》，接着把一本《雷马克评传》也读完了，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两点钟。可是还不能入睡。于是两只手交叠在脑后，赏鉴着对面桌案上一只瓶里面插着的两大枝桃花。花，从昨天起几乎算是全开了，只余了几个正要开放的苞，我想出不了早晨，它们也会开了的。叶子们也绿尖尖地见大了起来。从这花，我便联想到去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北四川路’。

《海燕》出刊而被停刊，《译文》复刊，《作家》创刊……这全是在那时候。这使我们每个人的每颗心上，似乎全绷紧了一条敏感的弦。更是我自己：兴奋，激动……这些繁响，几乎占据了我精神的整部。当我每次把一点关于每个刊物进展的消息带给他，他也总是不能够不泄露出自己为了欢喜而起的激动，可是他又要象若无什么稀奇似的，表示他的老到而微笑着。有时，他也要忘了这‘老到’便要从仰在藤椅上的姿势直坐起来——一只手常常是擎举着正在燃烧着的香烟——显出玩笑似的惊讶，惊叹一句：

“啊！这个样子啊？”这会使我们在他身边的人，全被感染得大笑起来。我自己的欢喜，就相同从万叠冰雪和岩谷积压下而奔流出来的春天的激流一样，冲洗着我的心……。

可是，当我们的笑声耸起时，他却又要象一只沉思的鸟雀似的，头微侧着，眼睑垂落，静静地坐着，接着也许吸一口烟，再轻轻地把身子靠在藤椅的背上，再接连地吸着烟……。那时候他已经见病了！已经不常能够同我们在楼下吃饭，或吃一杯酒。

“我们现在好了！要什么刊物有什么刊物……印书的地方也有……”一次我高兴得在他的面前竟拍着自己的腿。接着说：“我们的阵容现在可以了：有主力，有友军，有轻骑队，突击队……您是步兵加海兵出身，我是炮兵学校差一天没毕业的学生……。”

他笑了。可是很快这笑容就收敛起，把手指间的香烟向身边桌角上的灰孟里动了一下，眼睛静静的瞅着我的眼睛说：

“不要这样过于高兴了啊！”

是的，过了不久，就证实那时我确是有点过于高兴了——它们渐次地遭到了损害。

我爱，我尊敬，我所信赖的这个人，他能使我欢喜的眼泪，在他的面前倾流象春天泛滥而激荡的水似的人……他死了！

世界上，不足一年中死了巴比塞，高尔基。他们已经到了应该死的时候，而你——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伟大的母

亲——却不能死啊！可是你竟别我们而去！从此我们将要到处唱着，听着，哀悼你的哭声和纪念你的歌声：

复仇和前进……

二

为了在地图上增添一条河流，确定一段山脉……这河流和山脉如今我们在地图上看起来，它们的位置仅是一条细线，一粒米而已。科学家们却要用自己的生命象用一枝标杆，一具悬在细丝上的测锤似的，决定它们的位置，决定它们底高和深。为了要从陷埋在沙漠中几千年的古城里，获得几块骨头和磁片，好证明人类几千年以前的文化和生活……科学家们，便要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探深渊，跋沙海，攀绝壁……日与风、雪、冰、沙、豺、狼、酷暑……等斗争。在这斗争中，一个一个强健的人死了，骆驼、牦牛、骡、马、羊、狗……一批批地死了。死了的人们就用坟上的木十字，牲畜们则用自己被豺、狼、风、沙、洗刷白净了的骨架，作为后来者的路标……。这就是为人类建成完美的文化宝塔所用去的代价！我们后来者使用它，享受它，在博物院里我们很平凡地观赏这些陈列的骨头和磁片，我们是不会想到它们的来处和是怎样来的吧？那时候除了天然的障害以外，还要有人为的障害，那就是当时英国政府。他们不准赫定博士由印度的大路入西藏。使他们不得不历经艰苦，牺牲人畜，从荒僻的山底海中潜入！而潜入以后，拉萨的达赖又是派兵百般阻

留，甚至要逼他们从原路折回……。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了那时那些畸形的政治制度，它们对于人类文化是怎样一个浴血鬼似的敌人？这制度直到现在，也还是照样存在着。虽然施行这些制度的坏蛋们的本身和子孙，也要同别人一样——也许比别人更多些——享受这些用生命获得的结果，可是他们的制度却要保存着。

在这本探险记中，也曾有关于前清大员李鸿章的一段故事。他问赫定，瑞典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赫定说他们的国家也是个安乐的大国：

“在那里冬天既不太冷，夏天亦不怎热。那里没有沙漠和草原，只有田畴森林和湖沼。那里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贫的人。”

于是这位‘大员’打断了赫定的话，转身就向着他们翻译者的俄国人包罗夫说了：

“这真是一个可注意的国度！我将要劝俄国的沙皇占领瑞典。”

这使包罗夫窘了！他怎能够在一个国民的面前，翻译说这位‘大员’要劝沙皇吞灭他们的国家呢？于是他只好说：

“这是不可能的，阁下！瑞典王同沙皇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彼此从不含有任何恶意的。”

以下，赫定博士这样写着：

“后来李鸿章又向我问道：

‘您讲及，您曾走过东土耳其斯坦，北西藏，柴当和蒙古南部。为什么您的旅行只穿过我们的属国呢？’

‘为的研究和绘画那些不知名的部分，考察地理，地质和生物的情状，尤其是我要看看，是否有可以给瑞典王占领的合适省份。’

李鸿章很开心地大笑，把姆指翘得高高的，喊道：‘很好，很好！’在我是报复过了。他现在不追究瑞典是否有占领中国的属国之可能这问题了，他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岔过去，问道：

‘啊，您也研究地质学呀。然则当您在一片平原上驰过，远远地望见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时，您能够立时说出这座山有没有金矿吗？’

‘决不能！我先得驰到这座山、并且用岩石的理论研究它的矿石种类。’

‘感谢得很！这算不得什么本领，我也会做。老远就能判断出那里是否有金子，这才是本领呢。’

在这点上我只好承认失败了。……”

上面句旁的圆圈系我所加。我觉得这两句话，很能够代表了一般中国人‘口头上争胜利’的精神，‘大约摸’的精神。

李鸿章是前清担当国家大事的‘大员’，他无知识，腐败，不懂礼节……，如今我们是‘民国’了，并且已经‘民’了二十六年，我想，我们民国的‘大员’象李鸿章那样‘劝俄皇吞瑞典’，‘驰马看金矿’的精神不会再有了。可是，近年来真正要给他们的‘天皇’寻找可以占领的土地的，假词游历，考察……却偷测军用地图，捎带贩卖‘海罗英’，组织间谍机关……的‘某国人’，我们希望身当其任的‘大员’们，却不要太

懂礼节了，这一点却应该学一学李鸿章那点点精神：“……为什么您的旅行只穿过我们的属国呢……”问一问罢！

当雷马克由西线上归来，怜悯地追怀着在战争中一个个死下去的同伴；眼看着那凶残的炮火怎样粉碎了那些强壮的充满着青春和力量可爱的身躯……才写下了《西线无战事》，一部可纪念的书。据作者自己说，他也并不想借着这点点近乎偶然成就的土台，爬上去，成一个作家或名人，这使他丧失了自由，丧掉真挚的友情……这荣名和好意对于他，简直是一种软性的刑罚。他说：

“为什么一个人要从事著作呢？这是成名的和无名的作家未曾想念过的，所以他们拚命的寻找机会，孜孜的写作，只想着在作品上等着成功，从读者的心上固定他们的地位。假如他不曾恋着要这样干才能获得他的地位和声誉，他决不因此而日夜辛苦了的。这样便养成社会上的一种不可遏制的病态，在这种病态中，有千万人把他们的职业固定了。”

雷马克这几句话对于我国从事写作的，‘成名的和无名的作家’，应该也是有用的。

“为什么一个人要从事写作呢？”就是想要“从读者们的心上固定他们的位置么？”还是企图“在这种病态中，有千万人把他们的职业固定了？”

因为《西线无战事》获得了那次直接或间接，蒙受过大战创痛的读者们的爱好。因为这爱好是广大的，疯狂的……于是就不能不有一批专以造谣或是破坏为生，就相同臭虫，

蚊子，专以吸血为生似的人们，说：雷马克没有到过前线，只是在后方掘战壕，他写这部书已经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决不知道青年战士的勇敢底精神。而他写下的完全失掉了真实性等等……。在这谣言中，最漂亮的应该算他们发现雷马克曾教人制造白兰地酒的方法，因之便涉及道德问题，因之便引起了舆论哗然！同时，一份《弗希起》报上却也回答得很漂亮：

“教人制酒总比对于一个无辜的人烹调有毒的谣言要好一些……。”

事实呢，雷马克当教师的时候，有人确知道他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当然这谣言也算‘事出有据’了。不过，我们不知道这‘教人造酒’，又怎能和《西线无战事》拉到一起呢？就如早先有人说鲁迅先生的牙齿是黄的，胡子象龙王爷而涉及到他的文章一样。可见无论哪一个国家这类专以造谣为生的玩意儿的伎俩，大致总是相通的。

为的要在人类文化空白的表格上添加一点什么，就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作测锤，用无数生物的骨架作路标。——这是我读了斯文赫定博士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后所感到的。

为的要把在大战中所获得的创痛和罪恶，公平地伸诉出来，便要获得臭虫，蚊子，叭儿狗似的人们造谣与侮蔑——这是我读过雷马克评传后所感到的。

至于在这用‘人’叠成的沙漠上，所谓‘人类’的沙漠上，把自己的生命作测锤和标杆，使自己的一滴一滴流下来的血

迹作后来者的路标；把人类中大多数蒙得的创痛，苦难和不公，公平地伸诉出来的人：活着的，我愿于他们有光荣；死了的，我愿于他们有光荣！至于对这样‘光荣者’曾做过损害与侮蔑，或正在做着这样工作的人，我愿于他们也有光荣罢！

三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散文和小说，全是一九三六年内写下的。本来另外还有两篇‘杂文’，一首诗，也预备收在这里。就算作一年的成绩。后来，编者觉得有点太杂，恐怕读这集子的人，对于我的印象不大好，并且对于丛书的编制也不大相宜。于是相互商量之下，我就抽它们下来，待有机会再凑类似这样几篇，一同编起，也不为迟。

说到‘印象’这一层，广泛点说，无论‘作人’还是‘作文’，我从来是不大顾及的。譬如，一位新识者见过了我这人，对于他是起了一个怎样的印象呢？恶的？好的？不恶不好的？还是上海人所谓‘马马虎虎’的？这我不大管；读过我的几篇文章的读者，对于作者所起的印象是好的？恶的？或竟至什么也不起？这我也不管。我只是按着我要做，我能做，做下来就是。我爱‘真实’，不过，微小的，只要无伤于大的真实的‘撒谎’我也爱。就是说，我虽然不乐意把自己的印象故意装点金粉末，却也不乐意涂点污泥在上面，使人一见作呕。——‘作人’是这样，‘作文’也如此。

“我们要米吃……”记得在《水灵山岛》那篇游记里，

我曾写一个调查员下乡，坐在公所的大厅里，叠着两条腿，手里的毛笔旋来转去地，用着演‘文明戏’似的腔调问着两个乡民说：“你们需要什么呀？……”乡民们就那样答他了。从这里，我得到了一点启示，就是我希望自己，文章到实在写不出也挤不出时，仍归本行，还是去当兵吧！不应该学那位调查员似的，摇着笔杆问读者们：

“你们需要什么呀？”

这篇文章的题目本是‘前记’，可是关于在‘前记’里面应该说的话却没几句，竟信笔拖了一些其他。不过从这‘其他’之中和‘前记’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一点关联。那么，就任它们这样关联着罢。

我谨以这本书的名字，算作纪念我所尊敬的人，我愿于他有光荣的人。

一九三七。四。四晨十时——上海

目 录

第 一 辑

初夜.....	3
广田君.....	11
我研究着.....	16
病中的礼物.....	20
十月十五日.....	24
水灵山岛.....	28
未完成的构图.....	42
邻居.....	54

第 二 辑

为了爱的缘故.....	77
四条腿的人.....	115

第一辑

